



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抵达大夏（今阿富汗到巴基斯坦西部一带），意外见到了产自蜀地的细布。这一偶然发现，印证了汉朝之前中华文明便与外部世界存在隐秘联系。而鲜为人知的是，大夏本是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希腊人在中亚留下的据点——这意味着，张骞的足迹所至，是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首次重要邂逅。

这场跨越万里的文明相遇，并非孤立的历史片段。白钢在《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从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以下简称《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一书中，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更具整体性的历史图景，他将整个地中海区域视为一个连续的文明共同体，生动呈现出人类早期“文明共同体”的孕育与发展轨迹。

刘雅君

权力更迭中的“共同体”意识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宏观视角看，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核心贡献之一，是孕育并迭代了“帝国”这一政治形态，而这—成果的诞生，根植于该地区多民族、多城邦交织的复杂地缘格局。

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便建立了以神庙为中心的城邦，基什、乌鲁克、乌尔、温马等城邦国家常年征伐争霸，形成了早期的“世界体系”——城邦间的争霸不仅是权力角逐的手段，更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特定的文明扩张与融合机制。

公元前2375年左右，温马城邦征服了大部分苏美尔城邦，定都乌鲁克，建立起首个超越城邦范畴的大型政治体，近似于后世的帝国。但这份霸权转瞬即逝，北部阿卡德人击败苏美尔联军，摧毁乌鲁克城墙，建立起广域型的阿卡德王国。国王萨尔贡将都城建设为商业枢纽，树立了“武力征服+王权法治化”的统治典范。

这一时期，地中海文明的核心特征便是多民族的融合与共存。在阿卡德王国，阿卡德文明与苏美尔文明

桑田

在大众的视野中，“田野调查”总是发生在某个偏远的乡土世界。J.A. 英格利希-鲁埃克的《硅谷文化》却告诉我们：人类学的田野，也可以长在服务器机房隔壁，在一块小小的湾区土地上，紧贴着一万六千多家创业公司以及那些每天和代码、云服务、股权激励打交道的硅谷人。

作为一项民族志式的硅谷研究，本书并不是硅谷公司的产业史，而是一项关于技术高度饱和的具体生活世界的社会学研究，它的镜头瞄准的是技术工人——那些在工位之间、会议室里、通勤路上周旋的工程师、产品经理和项目协调者。

人类学的一大魅力，便在于对理解不同人的行动与生存方式保持热忱，其中最经典的提问即“他们究竟怎样安排自己的日常”。在这本书里，这一问题被换成了一个更具体的观察：当通信工具、协同软件、云服务的无缝嵌进生活之后，人是怎么被这些东西重新编排的？所谓“技术饱和”，不是指某项技术多么先进，而是指人已经很难找到一块真正不被技术触及的时空。

书中没有抽象地谈“过劳”与“异化”，而是盯住那些细小却高度重复的动作——刷新收件箱、在不同聊天频道之间来回切换、给共享文档加一条评论、在路上用手机改一行代码、信息不断抵达，而每一条信息都把某个“项目”推至面前：要不要回复、什么时候回复、是否需要拉一个新的会议、要不要再拆出一个子任务……哪怕人暂时停在原地，项目的队列却始终在脑子里滚动。

以“共同体”视角 打开地中海文明



便出现了融合趋势。阿卡德王国覆灭后，苏美尔人建立乌尔第三王朝，国王乌尔纳姆自称“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明确将两大族群纳入统一治理框架，并确立了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与神权王权相结合的统治模式。乌尔第三王朝的继承者伊辛王朝，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编纂完成《苏美尔王表》，将不同的苏美尔城邦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文明共同体。

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王国取代苏美尔—阿卡德共同体，第六代君主汉谟拉比进一步完善帝国形态：颁布《汉谟拉比法典》规范社会秩序，建立职业化军队保障疆域安全，健全官僚体系强化中央集权，将帝国治理推向新高度。此时的巴比伦城，不仅是政治与经济中心，更被赋予浓厚的神圣性，王权的合法性与神性深度绑定，形成了“王权神授”的治理逻辑，神权与王权的融合治理成为共同体的核心特征之一。

亚述帝国与波斯帝国的崛起，进一步推动共同体边界扩容与治理成熟。亚述人借鉴巴比伦神权理念，首创行省制度，实现集权与地方治理的平衡；波斯帝国征服巴比伦后，兼容并蓄各文明制度与文化，将疆域拓展至中亚，其最东端的大夏，成为共同体连接东方文明的纽带。这一系列权

力迭代，本质上是共同体不断突破地域、整合文化的过程。

多元共生的政治形态

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争霸型整合不同，古埃及依托尼罗河的封闭环境，形成了以“神权都城”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最终以独特姿态融入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丰富了共同体的多元内涵。古埃及文明延续三千年，从公元前3110年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至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覆灭，其帝国逻辑的核心，是“都城即神域”的神性统治体系，都城不仅是政治中枢，更是连接天地秩序、彰显王权合法性的精神载体。

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后，定都孟菲斯，这座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成为埃及王国的象征——现代语言中“埃及”一词的词源，便来自孟菲斯。埃及人的信仰中，法老并非凡人，而是神的化身，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通过法老实现统一，而孟菲斯作为法老的居所，自然成为人间神性的载体。

“孟菲斯神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统一性，以都城保护神普塔为核心，改造传统多神信仰，用“心（精神）与舌（话语）创造世界”的抽象理念，超越了自然崇拜的原始叙事，为法老的统一统治提供了精神支撑。这种“都城—神权—王

所谓“硅谷人”的？

在硅谷，人可以暂时放下“某某国家移民”或“从属于某某宗教传统”，而更愿意用“我在哪家公司”“我做什么技术栈”“我负责哪个项目”来介绍自己。身份的中心从“文化有机体”转移到了“项目—岗位”。鲁埃克发现，这种重复并非完全自由的自我选择，它背后有一整套“带宽控制”机制：组织在筛选谁可以留下、谁被认为“适合团队”，平台和算法在决定哪些内容、哪些品味被推到眼前，招聘流程在用一套“看上去中性的”工具做出分筛。

例如，书中提到了MBTI测试——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你是I人还是E人”，但它最初的使用场景，是希望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用一套标准化的性格分类，把来自亚非欧美的人重新编入一种“可管理的类型体系”。换句话说，多元性的背后，站着一整套把人切分为抽象类型的技术与制度。每个人都必须用一套被算法和大厂预先准备好的分类体系来展示自己，才能被“看见”。

鲁埃克笔下的硅谷，就在这种张力中运转：一方面，它确实为来自全球的个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它也在通过各种显性和隐性的筛选机制，把多元熔铸成一种高度工具化的统一性——“能使用、能协作、能高效配合项目需求”的人。

书中还谈到了一个典型的现象：“外包”，即从换桶装水到擦皮鞋、给汽车加油甚至带感冒的孩子看病，都尽可能地交给他人去做，自己则专注于一个技术项目，而水工、皮鞋匠和

即便对外扩张，其统治合法性仍依赖于神权叙事。这种独特的帝国模式，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争霸型帝国形成对比，共同构成了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多元共生的政治形态。

中王国时期，都城迁至底比斯，太阳神阿蒙与拉神被合二为一，成为全国最高神。到了新王国时期，第十八朝法老为削弱阿蒙神庙祭司的权势，推行激进的宗教改革：独尊太阳神阿顿，改名为阿肯那顿，将首都迁离底比斯，建都阿玛那。中王国至新王国时期的这场宗教改革虽未能长久，却彰显了宗教与政治的深度绑定，也凸显了古埃及治理模式的独特性。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不再局限于尼罗河流域的核心疆域，势力范围逐步延伸至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与赫梯王国等强权展开长期争霸。

公元前1275年的卡迭什之战，是世界军事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早大规模战役，双方投入数万兵力激战，战后签订的《埃及—赫梯和约》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际条约之一，以法律形式划分了两大帝国的势力范围。

疆域的扩张使埃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区域帝国，人流、物流与思想观念的跨区域交汇，打破了古埃及长期的封闭状态，推动其与西亚文明逐渐形成共生体，最终融入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整体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的帝国路径始终未脱离神权都城的核心逻辑——

陪诊师也都拥有各自的“技术项目”。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现代人不只是被技术和组织“项目化”，也是在主动学习用项目化的方式重建自己的人生。

这也是我们在读《硅谷文化》时会有的一种强烈感受，其实对于现代心灵而言，一切都会与“如何配置人生资源”有关。硅谷的技术工人通过把大量生活琐事外包出去，来为自己的核心项目腾时间；而我们则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做类似的计算：钱、时间、注意力、情感精力，这些有限资源要怎样分配，才能支撑我们心目中的“好生活”。

从这个角度回头看《硅谷文化》，它写的就不只是一个地区的特殊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现代生活一般性处境的案例：在技术饱和、身份多样而又被筛选的世界里，人还能怎样给自己的生活“编目”？是任由各种工作和平台把人拆成无数碎片，还是反过来，利用这些同样的工具，把自己的大项目一点点搭起来？

也许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已深深卷入这种“项目化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也在尽量问清楚：这些项目之间，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值得我这一生去完成的？这一问，大概就是信息时代版的“人生终极问题”了。而《硅谷文化》这本书，恰恰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在看清硅谷人的日常时，也顺便问一问：在全球都变得越来越像硅谷的当下，我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人”？（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讲师）

《硅谷文化》 [美]J.A. 英格利希-鲁埃克 著 丁依然 董晨宇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明叙事的重构

以往，我们习惯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与中国并称为“四大文明”，这种视角虽凸显了各文明的独立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文明间的内在关联。白钢提出的“三大文明圈”学说——将古埃及、古巴比伦归入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打破了孤立看待单个文明的局限，以“共同体”视角展现文明间的交往与融合，彰显出独到的史学视野。

从书中可以看到，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之所以能成为有机整体，核心在于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而将地中海区域视作整体的认知，早在苏美尔、阿卡德时期便已萌芽。苏美尔人、阿卡德人曾将地中海称作“上海”，将波斯湾称作“下海”，以“从上海到上海”的表述指代当时认知中的最广阔地域，这种空间整体观为文明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概念不断传承，直至公元3世纪演变为拉丁语中的“地中海”，成为专属地理称谓并沿用至

叶风天

如今，《哈利·波特》系列早已超越普通幻想小说的边界，成为跨越年龄、地域与文化的全球文化现象。当读者们沉浸于霍格沃茨的奇幻叙事时，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之而来：这部以少年成长为核心的作品，为何能穿越时光，收获长久且广泛的喜爱？

林品所著的《J.K. 罗琳的幻想文学作品研究》（以下简称《幻想研究》），通过深入剖析该系列的文本内涵与社会价值，为我们解读这一流行文化奇迹提供了独特视角，更让我们读懂了这份想象力背后的深刻重量。

长久以来，儿童与成人被置于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中：儿童被认为是纯粹、天真的代表，而成人则被贴上复杂、社会的标签。这种认知其实固化了“儿童游戏、成人工作”的认知，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儿童进入成年世界的可能，也让成年人丧失了重回儿童世界的乐趣。

《哈利·波特》恰好诞生于波兹曼所言的“童年消逝”的电子媒介时代。电视、电脑等电子设备打破了传统印刷构建的信息壁垒，儿童们开始逐步进入成人的世界。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幻想研究》认为，《哈利·波特》打破了“儿童文学”的惯性思维，并展现出“后童话”的特质——它既不局限于儿童文学的单纯叙事，也不完全采用成人文学的跨龄作品。

林品认为《哈利·波特》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多的受众，关键在于其内容设定中包含了许许多多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结构，其中的奇幻力量可以看作一面映照现代社会技术发展的镜子，折射出人

今，见证了共同体意识的长期延续。

这种叙事框架的核心，是一种“去本质化”的文明观：文明并非孤立存在一成不变的固定实体，而是不同人群、观念、制度与文化相互碰撞、借鉴、融合的动态产物。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便在于这种持续不断的跨族群交往——从苏美尔城邦间的战争，到阿卡德王国的多文明融合，再到波斯帝国的跨区域治理，每一次交往都推动着文明边界的拓展与内涵的丰富。每一次帝国权力的更迭，都伴随着文明共同体范围的扩大与治理模式的升级，这些历史进程，不仅塑造了地中海地区的文明格局，更为人类早期跨文明交往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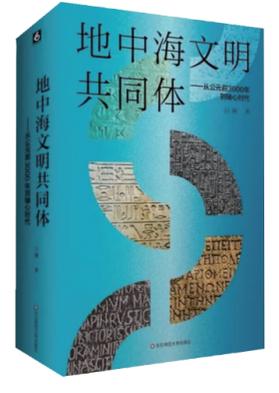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帝国化历程，也深刻展现了人类早期大型政治组织建设的普遍规律，为探索人类文明政治形态的演进提供了关键样本。

按照白钢《世界文明5000年》的写作构想，在《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一书出版后，还将陆续推出“印度文明共同体”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相关论著，三者共同构成对世界文明“三大文明圈”学说的系统阐释。这一系列研究，不仅是对世界文明史叙事的补充与修正，更是中国学者在世界文明史领域建构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探索，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史学叙事的垄断。

可以说白钢的《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不仅系统梳理了地中海地区文明演进的脉络，更致力于构建中国学者视角下的世界文明史话语体系。这种探索的价值，在于引导我们跳出单一文明的局限，以交往、融合的眼光回望历史，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这份来自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历史启示，对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到张骞出使大夏的故事，我们便能读懂这段历史的深层意义：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相遇，并非偶然的“邂逅”，而是两大文明圈长期独立发展、不断拓展交往边界后必然的历史连接。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到如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明互鉴，这份跨越千年的文明交往从未中断，而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历史，正是理解这种跨文明交往根源与逻辑的关键钥匙。（作者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从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白钢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硅谷”变成“田野”

想象力背后的重量